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薛凡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关键词】 陈寅恪 乾嘉学派

陈寅恪治史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其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学派之影响关系甚密。但他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变迁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中国传统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对陈寅恪产生影响。再加上他游学海外多年，西方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和兰克学派的学术观点也对他影响颇深。这样的生活背景和饱受世界思潮之激荡的经历又使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有很多超越前人的地方。有关陈寅恪史学方法的研究已有余英时，汪荣祖等多位学者涉及，但有关陈寅恪与乾嘉学派关系的研究多分散而不成系统。故此笔者根据前人研究的基础仅就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这一方面再进行系统的归纳分析。

一、陈寅恪对史料的处理比乾嘉学派更加成熟

比较法是史学研究中的利器为历代史家所青睐，作为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向重比较方法，已是中外学者共识。他对比较法的运用比乾嘉学派常用的正史内部的纪、志、表传的比较，正史之间的比较，不同版本史书的比较，正史与其它文献的比较法更进一步。在他进行考据研究时除常用到我国传统的史部典籍外，还经常运用道藏、佛典、小说、诗文、笔记、野乘、地志、墓志、书谱、碑刻等，甚至中亚各族和欧洲的许多非汉文史料也经常信手拈来。在他的论述中，中外史料的比较极多。陈寅恪在他1923年的家书中即那篇著名的《与妹文》中曾言他学习域外语言就是为了直接研读和比较各种学术文化。而且他语言天赋极高，从他保存下来的学习笔记看，当时陈寅恪除梵文、巴利文，还学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纥文、朝鲜文、怯卢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等。这种高明的见识和广泛的语言学习经历使陈寅恪在做学问时享有很大的优势。如通过汉、藏、蒙文献比较研究，首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乃取之于八思巴《彰所知论》，是揉知了多个民族神话的民族历史，并指出《蒙古源流》汉译本出自于满文本，而满文本又译自衮扎布之蒙古文本。由此疏清各文间的关系。陈寅恪还根据其它文本对《蒙古源流》做出了校正。

除了用不同语言史料比较外，陈寅恪最被人称道的是以小说诗文和正史比较以考正史实，发现被千年岁月风沙所掩盖的真实。陈寅恪认为中国诗歌中常提及、人地、事等资料可资校正史籍中的错误。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史书不详，如到诗歌背面去寻觅，竟可将来龙去脉大体探明。如《柳如是别传》中从钱、柳诗文中探寻复会事迹。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从秦妇逃难之描写中，考证出当时土地沙化，粮食缺乏并由此黄巢之乱和黄巢之乱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以小说解说历史。他认为每朝人写小说离不开所处社会。后代学者皆可以从其中窥得当时政治状况和文化状态。小说的人物情节虽然都是虚构，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风情和历史背景却难以编造。如从《莺莺传》中可以探知中唐以后门第情况，道德形态等。

陈寅恪也很重视新史料与旧史料的比较，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他又说：“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

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他在研究敦煌学时就常使用的考古资料和国外保存之前未被中国发现的史料。陈寅恪曾对王国维的史学成就和治学方法加以概括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印证。二曰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这三点虽是对王国维的叙述，但也是陈寅恪的自况。比如武则天以一女流，却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后世史学家对此缺少充分的解释。陈寅恪以敦煌石室发现的《大云经》残卷中有以女身受记成为转轮圣王成佛的教义，做出了武则天利用了佛教符谶作为篡唐的符命的解说。又如陈寅恪在谈论府兵制时指出唐代府兵的史料虽多，但是还应该参用日本的《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来推比补充，因为日本制度多仿唐制，而且日本的保存比较完整。再如三国时代曹冲称象和华佗的神奇医术人人皆知，很少有人怀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陈寅恪熟悉佛教经典及传说，指出这些记载都渗透进了佛教和印度文化。从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经典的影响，使得一些史籍掺入了佛教的传说，失去了它的历史真貌。

陈寅恪在史学考据中极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这与乾嘉学派的风格相似，但他对史料的考释又具有不同与清儒的特别眼光。乾嘉学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史料的着眼点往往停留在个别字句的考释上，而未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更深层次的挖掘，因此对于个别具体往往考订甚精，但缺乏通过史实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存在形而上学的缺点。胡适曾对此做过一针见血的评价：“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破碎。”^[2]“这时代的学者只有功力而没有理解，终身只做琐碎的工作，而不能做贯通的思想，如蚕食叶而不吐丝。”^[3]“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4]而陈寅恪则不同，他也重视史料的完备和考据的严谨，但是他认为考据只是治史的手段，而不是治史的目的。他主张在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之后就要得出微言大义式的结论即从对历史现象的考据而“其渊源之所以出及其成立之所以然”，亦即应透过历史现象解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史料的汇集初看起来只是史料的堆砌，但细看之后可以发现在这些史料之后陈寅恪表达了很明晰的观点揭示了很多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如讲两晋南北朝史时，明确强调司马氏代魏是东汉儒家大族统治权的复辟，在讲隋唐史时，指出唐诗可以增补武宗以后历史的许多缺漏，并说李牛两党弄权，其实是两党宦官的斗争等等。这些观点都是陈寅恪在汇编大量史料后，运用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从现象深入本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在陈寅恪的研究过程中不像清儒那样仅限于汇集排比史料以归纳法推求出结论，而是常常穿插运用带有强烈的西方逻辑推理色彩的演绎方法，使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唐长孺曾赋诗称颂道：“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先生白有如椽笔，肯与钱王作后尘？”赞叹其治史方法超越了乾嘉考据学。

二、陈寅恪的研究范围比乾嘉学派更加广泛

史学界公认陈寅恪研究范围极广，在魏晋南北朝史、隋

唐史、宗教史、各民族史、文化史、敦煌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开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达到了近代中国史学的高峰。

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来说，陈寅恪提出了一系列诸如门阀士族、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统治集团党派分野势力升降等论题，直接培养或间接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成就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学者，开创了近代史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学科领域，奠定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格局。从宗教史来说，除从佛经中探寻中国小说，传奇的原型，籍以说明印度神话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从佛典中追溯我国某些文学体裁和著作体例的渊源，从而论证佛典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和从语法音韵等方面探讨佛典在语言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外，陈寅恪更关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说“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5]，“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6]为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补充。从民族史来说，陈寅恪对突厥学，藏学，蒙古学都有贡献，他没有局限于大汉族主义的传统观点，使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又考证了在少数民族研究中因语言不通造成的一些错误，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从文化史来说，陈寅恪完成了文化史观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从敦煌学来说，陈寅恪创立了“敦煌学”并从理论上阐发了敦煌文献的珍贵价值，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广泛发展。从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来说，陈寅恪提出了从史学角度来重新认识文学著作的观点，起到了打通文史的作用。

综上所述，陈寅恪的研究范围比乾嘉学派只专注于小学和儒家经书要广泛的多。

三、陈寅恪的治史目的与乾嘉学派相比更经世致用

乾嘉学派产生和发展均在文网最密的康乾时期，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乾嘉学派虽也提倡经世致用，但极为克制。大部分乾嘉学者的著述都很少直接批判社会现实。他们常常强调“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事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7]他们的治学目的是还原事实的真实，对

（上接第17页）作的效率。二是明确采集的范围、内容、利用和法律责任，促进口述档案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三是拓宽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展开校史口述档案的采集工作。四是严格对采集内容进行科学鉴定，保证其历史价值。

3、建立校史口述档案专库。档案室要在原有的纸质档案方面的整理、编目和保管经验基础上，大胆探索，推陈出新，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工作程序，建立校史口述档案专库，有条件的可以成立校史口述档案馆。

4、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工作队伍。口述档案的形成不是简单的录音、记录、誊写的过程，它是一项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培养一支掌握档案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的工作队伍，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研究精神、吃苦精神、学习精神，是拓展口述档案，完善校史修订的前提。

高校不仅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重要使命，同时也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教育资源。校史口述档案作为一种特殊的档案资源，真实反映了一所高校的成长历程，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和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值。为了获得学校发展过程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办学成就，

（上接第32页）缩比应小于40:1。用图像处理软件处理电子照片档案，一般应只停留在增强图像的效果上，对于经过合成、变形等特技处理的电子照片，不能作为档案保存。第二、对已经归档的电子照片档案，应刻录成光盘进行保存，以防被篡改。第三、收集时要做好鉴定工作。鉴定电子照片是否客观真实，首先应进行技术鉴定，对其形成的技术过程、设备及人员的可靠性进行鉴定；其次是内容鉴定，指运用各种手段检验图像是否有变造或伪造，具体地可从光学成像原理角度考察照片中光线的一致性、透视关系的合理性等，以

采用的资料采取几乎纯科学的态度，大量罗列事实但不表明自己的立场。而陈寅恪则不同，他的治史除还原历史的真实外，尚有强烈的经世目的，绝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要我手写我口，作文著己心。如他晚年失明后仍写出八十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其目的是借此宣扬民族气节。他在此书缘起中谈及著述目的曰：“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如他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史述论稿》从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以及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详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亦有从中考求治国得失之深意。再如陈寅恪有多篇研究佛教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光研究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演变，亦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命运即凡佛教中不能适应中国传统者均亦消亡，只有中国化的禅宗思想得以流传来暗示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即全盘移植西方文化必不能成功。

陈寅恪之所以对乾嘉学派有所超越，一方面在于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另一方面他生活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之际，不可避免的接受了大量西方近现代文化，使他在分析考证各种问题时，能触类旁通，融汇古今，学贯中西。他对乾嘉学派的继承和超越，使他为中国史学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也是他成为一代史学大师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
- [2]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4.
- [3] 郑大华.《胡适全集》第四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91.
- [4]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00.
- [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0.
-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0.
- [7] 朱丽霞、肖晓阳.《钱大昕与陈寅恪治史方法之比较——从一个侧面看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J].文史研究,2005,02:92.

作者简介：

薛凡(1983—)，女，江苏洪泽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继承办学中积累的教育理念和精神，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口述档案资源，“彰既往而察未来”，开创教育事业新途径。

参考文献：

- [1] 黄峰. 口述档案编研原则与方法 [J]. 北京: 北京档案, 2006 年第 2 期.
- [2] 黄项飞. 口述档案: 构筑民族的立体记忆 [J]. 南京: 档案与建设, 2005 年第 7 期.
- [3] 刘旭光、薛鹤婵. 试论口述档案的价值 [J]. 北京: 档案学通讯, 2007 年 4 月.
- [4] 刘新良. 试论高等学校周年校庆档案与校园文化建设 [J]. 北京: 兰台世界, 2007 年 2 月.
- [5] 黄钰、张颖丹. 把口述档案作为档案工作的新领域 [J]. 哈尔滨: 黑龙江档案, 2004 年 4 月.

作者简介：

姓名: 陈爽琛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 年 6 月 籍贯: 福建福州 职称: 馆员 学历: 大学本科 单位: 福建省泉州师范学院
通信地址: 福建省泉州师范学院综合档案室
邮政编码: 362000
电话号码: 15905056608/13960286608
电子信箱: mayduck@163.com

及从历史学、社会学角度考察照片图像中主体与背景的相关性等。第四、对保管人员采取严格要求。

参考文献：

- [1]、《档案馆业务建设与管理》，档案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盛彦主编。
- [2]、宗培岭、谭争培《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与何嘉荪同志商榷》，《档案学通讯》1997 年第 1 期。
- [3]、丁文进等编译《档案术语词典》，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68 页。
- [3]、陈作明《档案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浙江档案》1996 年第 9 期。